

《昆仑旅行日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昆仑旅行日记》

13位ISBN编号：9787806960844

10位ISBN编号：7806960848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温世霖

页数：2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昆仑旅行日记》

内容概要

《旅行日记》中有不少突出的“专题调研”，例如敦煌石窟的发现，可能属最早的详述。作者常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各地事务，例如他在演说中力劝新疆商界建立商会，振兴实业以抵御俄国的经济侵略；他在建议哈密民族自治当局选派青年到天津培训技艺时，还具体到托付家乡的回族友人要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

作者的旅行又像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书中记载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和令人震撼的西北百姓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作者以教育救国为职志，旅行考察的焦点是学堂。本书按其线装形式及著作年代1910均属古籍，原书铅字排印，无标点，不分行。民国三十年1941由家人印行，无“版权页”。

《昆仑旅行日记》

作者简介

温世霖（1870—1934），字子英、支英，清末秀才，天津水师学堂肄业。上世纪初，先在家乡办温氏女子家塾，由其母徐氏和妻子安氏主持。1905年在城里鼓楼西办普育女学堂，又增聘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和陆文郁之姐陆闾哉任教，故张、郁都可算是我市的第一批小学教师了。后来，张祝春和天津近代教育家马千里结婚时，在普育女学堂举行了新式婚仪，成为津门第一对行鞠躬礼的新婚夫妇。

在创办普育女学堂的同时，温世霖在天津还参与天津第一份画报——《醒俗画报》和《新民意报》的工作，鼓吹新政宣传进步，两报的主笔分别请陆文郁和马千里担任。以后，这两份宣传媒体都因为得罪当局，被迫停刊。

1908年，温世霖和北仓人孙洪伊（1872 - 1935）等一起搞地方自治，从事政治活动。1910年被推为全国学生界同志会会长，因带头请愿和号召罢课，被清廷逮捕，充军发配新疆，后写有《昆仑旅行日记》一书，记载其发配过程和沿途观感。其中有梦回故乡与母妻相见和又去普育同师生一起开会等事，还有入新疆后受到早年“赶西大营”的天津老乡的后代等接待欢迎的情况，都非常感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温世霖获释返津，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曾先后担任过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部长、国民党燕支部总干事，1913年后还相继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和国会议员等。1924年直系曹锟下台后即退出政坛，继续从事社会公益和办学活动，1933年将普育女学堂扩充为普育女子初级中学，由其子温祖荫主其事。

此后，温氏族人中还有多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温瀛士又在乡间创办了普育女子小学，温瀛杰长期在官立宜兴埠小学为校长，温瀛举之妻刘绛文女士也在城里的普育女子初级中学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普育初级女中设高中部，扩充为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更名为市立女三中，现名中山中学，地址在鼓楼南的原广东会馆附近。

温世霖在族内同辈中排行第七，乡人尊称其为温七先生。他和创办南开学校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有亲戚关系，在其著述的《昆仑旅行日记》中有较详细记载。早年，张伯苓的父亲久庵公曾应聘在宜兴埠大族温、杨两家教过家馆，张伯苓也随去附读多年，其原配夫人安氏也是宜兴埠人。因此，近有人在忆旧文章中说张伯苓也是宜兴埠人，有误。张家住在城里，祖籍山东，特附记如上。

《昆仑旅行日记》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 昆仑旅行日记序 先兄支英公传略 直隶四次请愿之大冤狱 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初七日 ~ 十二月二十九日 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一日 ~ 五月四日 书后附录 天津宜兴埠的两个温氏教育世家 温霖的生平与普育女学堂的发展史 同乡杂忆温氏家族 温世霖与津立宪运动 温世霖与《昆仑旅行日记》 天津商帮在新疆

精彩短评

1、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昆仑旅行日记》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

，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稟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

“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扞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

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轡。”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的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

《昆仑旅行日记》

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玘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这哪是流放边疆，到处被当做上宾。各地似乎都在蠢蠢欲动，革命思潮一触即发，而满清官员惟尸位素餐。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随路游历时，发现各地风气开化不一，所谓自治立宪，不能以道里计。那么现阶段诸学者提出的宪政治国，是不是为时过早，还要等几年国民教育，等中产阶级稳定后再实施？

1、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

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

逵或霹雳火秦明。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稟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扞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

谭。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轡。”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的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

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

《昆仑旅行日记》

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昆仑旅行日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